



殷功利 著

中国贸易顺差研究： 结构、效应与可持续性

A Study on Trade Surplus in China: Structure, Effects and Sustainability

Trade Surplus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安庆师范学院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中国贸易顺差研究： 结构、效应与可持续性

A Study on Trade Surplus in China :Structure 、 Effects and Sustainability

殷功利 著

Trade Surplus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贸易收支是国际经济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国贸易顺差是学术界、实业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中国贸易顺差的结构、效应及可持续性,探索其运行规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际经济理论,也可为我国科学地制定贸易、外汇、外资、产业、汇率等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本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分析和探讨:(1) 相关文献回顾及评述;(2) 贸易顺差的基本理论;(3) 中国贸易顺差结构;(4) 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及效应;(5) 中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的经验分析;(6)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国际比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贸易顺差研究:结构、效应与可持续性/殷功利著. —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6. 1

ISBN 978-7-312-03893-8

I. 中… II. 殷… III. 贸易顺差—研究—中国 IV. F752.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99607 号

出版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安徽省合肥市金寨路 96 号,230026
<http://press.ustc.edu.cn>
印刷 安徽省瑞隆印务有限公司
发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 710 mm×1000 mm 1/16
印张 12
字数 242 千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5.00 元

前 言

贸易收支是国际经济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中国贸易顺差是学术界、实业界长期关注的热点话题。研究中国贸易顺差的结构、效应及可持续性,探索其运行规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国际经济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为我国科学地制定贸易、外汇、外资、产业、汇率等政策提供参考依据。

本书通过贸易顺差结构、影响因素、效应和国际比较的分析,考察了我国贸易顺差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通过对贸易顺差历史的考察,总结了贸易顺差的演进规律。另外,本书还基于跨时贸易理论和内生结构突变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问题,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及效应进行了实证。

本书的理论意义在于:一是推动相应的国际贸易理论在中国的实证应用;二是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并促其发展;三是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本书的实际意义在于:一是从顺差结构来看,只有对中国贸易顺差结构进行全面分析,才能明确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我国对外贸易发展战略调整的着眼点和立足点,缓解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才能正确定位贸易政策。二是从顺差持续性上看,我国外贸顺差的可持续性不仅关系到出口增长的发展趋势,也关系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等诸多方面。贸易顺差能否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外贸、外汇、外资、财政等政策的走向。只有在认清我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及判断其能否持续等条件下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降低其负面影响。三是通过与日德贸易顺差比较研究,总结出他们改善贸易顺差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对贸易顺差的影响,这会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改善提供有益借鉴。

本书运用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结合的方法、比较的分析方法、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通过实证分析对我国贸易顺差的发展、现状和特征进行客观描述,又根据规范分析对我国贸易顺差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做出理性判断,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科学的对策建议;通过分析日德等国家贸易发展历史及其顺差原因、贸易构成及处理方式,并与我国贸易顺差进行了比较;通过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法分析了我国的贸易顺差的持续性、影响因素、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等效应。

本书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了研究:(1) 相关文献回顾及评述。就贸易

顺差原因、影响、治理措施及持续性等与本研究密切相关的中外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评述。(2) 贸易顺差的基本理论。首先对贸易顺差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进行了分析,然后就经常项目顺差与储蓄投资的理论、跨时贸易理论、国际产业转移理论、结构分析法及弹性学说进行了探讨。(3) 中国贸易顺差结构。先从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背景进行了分析,而后分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地区结构,继而剖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商品结构和中国贸易顺差经营主体结构,最后分析了中国贸易顺差的贸易方式。(4) 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及效应。就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继而就中国贸易顺差效应进行了探讨。(5) 中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的经验分析。包括简要分析了中国进出口关系的典型事实,建立了理论模型,对中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进行了计量分析。(6)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国际比较,就贸易顺差额进行了国际比较,其后分别对贸易不平衡度、贸易顺差结构、原因及处理措施进行了国际比较。

主要得出了以下结论:(1) 从中国贸易顺差结构来看,中国大陆主要的贸易顺差来源地是香港地区、美国和欧盟,国内顺差城市的地理分布集中在东部沿海;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得到了极大的优化,从以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导转换到以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导,我国出口商品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是若从价值链的增值环节看,我国在国际贸易中仍然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环节,我国的劳动力要素密集的性质未变;外资企业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加工贸易在绝大部分年份里是我国贸易顺差的主力军。(2) 从中国贸易顺差影响因素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国内收入、国外收入对我国贸易顺差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2005年汇率改革后,在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大于20%的条件下,我国贸易顺差反而增大了。因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改善其贸易逆差在实践中是不合理的。中国参加国际垂直分工程度的增强对中国贸易顺差增长有促进作用。(3) 从中国贸易顺差的效应来看,中国贸易顺差对中国实际有效汇率、对外直接投资、通货膨胀、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及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4) 中国贸易顺差具有弱可持续性。根据经常项目收支跨期分析,从基于内生结构突变的计量检验结果来看,一是中国进出口之间具有包含截距项、斜率项都发生了变化的长期均衡关系,中国贸易顺差具有可持续性,表明出口贸易受到了外汇外贸体制改革及“入世”等制度变迁及2008年美国发生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既包括鼓励出口的影响,也包括阻止出口的影响;二是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弱可持续性,而非强可持续性,贸易出口容易受到国外经济环境的影响;三是出口主要受进出口间长期均衡关系的约束,其偏离均衡会在下月得到修正以保证进出口关系不会明显偏离均衡状态,出口企业是理性的,会自动对各期的出口进行调整,以实现跨期利润最大化。(5) 从中国贸易顺差的国际比较来看,与日本、德国相比,一是从贸易顺差额来看,我国贸易顺差额不大;二是从贸易不平衡度来看,我国贸易不平衡度不高;三是从贸易顺差结构来看德国的贸易顺差质量

第一,日本第二,我国最差,分析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四是从贸易顺差原因来看,通过对日本、德国顺差原因的分析,可知一经济体在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贸易顺差带有一定的普适性,企业的技术创新、企业竞争战略及政府的支持也是顺差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而我国企业在对外贸易中惯用价格战,缺乏战略,技术创新不足,政府也缺乏对对外贸易制定系统、科学的促进体系。(6) 中国贸易顺差属正常现象。从国际经验来看,一经济体在其工业化发展过程中出现贸易顺差带有一定的普适性,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工业化的道路上,我国的外贸顺差也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自然发生的,具有长期性和弱可持续性。从我国的外贸顺差与我国的经济总量和对外贸易规模相比来看,基本上是平衡的,我国外贸顺差持续的时间远远低于德、美、英、日等发达经济体。从贸易不平衡度来看,与日本、德国相比,我国无论从对外贸易顺差额年平均值,还是从年贸易不平衡度超过10%的年份数量来看,我国贸易不平衡度不高。因此,我国的对外贸易顺差实属正常现象。

本书的创新有三点:一是以日本和德国为例,对我国对外贸易顺差进行了国际比较。通过分析这些国家贸易发展历史及其贸易顺差原因、构成和处理方式并与我国贸易顺差进行比较,提出了解决当前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政策选择、调整、搭配方案。二是关于贸易顺差可持续性研究的创新。以往相关研究主要采用外生结构突变的计量分析,采取数据样本是年度数据。本书采取内生结构突变的计量分析,采取数据样本是月度数据,以得到比使用年度数据样本更准确的结构突变时间点,把可持续性进一步分为强可持续性和弱可持续性。三是贸易工业制成品的分类更加细化。本书把工业制成品细分为化学成品及相关产品、按原料分类的制成品、机械及运输设备及杂项制品,以得到更明确的经济增长因素。而以往多分为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分类比较粗。

本书的不足之处主要有两点:一是未对顺差的合理范围做一个估计;二是从新型的国际生产分工的视角去解释我国贸易顺差有待进一步深化。

殷功利
2015年10月

目 录

前言	(i)
第 1 章 导论	(1)
1.1 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1)
1.2 文献综述	(2)
第 2 章 贸易顺差的基本理论	(16)
2.1 贸易顺差促进经济增长的理论	(16)
2.2 经常项目顺差与储蓄投资的理论	(17)
2.3 跨时贸易理论	(18)
2.4 国际产业转移理论	(24)
2.5 结构分析法与弹性学说	(26)
第 3 章 中国贸易顺差结构分析	(28)
3.1 中国贸易顺差产生的背景	(28)
3.2 中国贸易顺差的地区结构	(42)
3.3 中国贸易顺差的商品结构	(53)
3.4 中国贸易顺差经营主体结构	(66)
3.5 中国贸易顺差的贸易方式	(71)
第 4 章 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及效应	(87)
4.1 中国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	(87)
4.2 中国贸易顺差的效应	(101)
第 5 章 中国贸易顺差可持续性的经验分析——基于内生结构突变的单位 根及协整检验	(123)
5.1 中国进出口关系的典型事实	(124)
5.2 理论模型	(130)
5.3 计量方法	(131)
第 6 章 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国际比较	(136)
6.1 贸易顺差额的国际比较	(136)

6.2	贸易不平衡度的国际比较	(137)
6.3	贸易顺差结构的国际比较	(139)
6.4	贸易顺差原因的国际比较	(148)
6.5	贸易顺差处理措施的国际比较	(151)
第7章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159)
7.1	主要结论	(159)
7.2	政策建议	(162)
参考文献		(173)
后记		(183)

第 1 章 导 论

本章主要介绍本书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文献综述。

1.1 选题的理论意义和实际意义

贸易顺差的不断增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之一,1982 年我国的贸易顺差为 29.9 亿美元,1990 年为 87.4 亿美元,2008 年达 2981.3 亿美元,2011 年为 1551.3 亿美元。随着贸易顺差持续的增长,近年来关于贸易顺差对我国经济发展负面影响的讨论越来越多地在学术界及政府有关部门展开,主要观点有“人民币升值论”“资源和能源快速枯竭论”“贸易条件及生态环境恶化论”(吴汉嵩,2007)“流动性过剩论”“投资过热论”“资产价格泡沫论”“通货膨胀论”(唐建国,2007)“贸易摩擦论”(张家胜等,2007)等,据此呼吁“减顺差”。实际上,贸易顺差除了以上所述的负面影响之外,它可能还有更为重要的其他影响,但似乎学术界关注不够。早在 1664 年,重商主义的代表人物托马斯·孟就指出,相比国际收支顺差而言,只有贸易顺差才能真正增长财富。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F. Machlup 和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 R. F. Harrod 等人基于凯恩斯投资乘数学说,提出了对外贸易乘数理论,该理论认为:仅当一经济体贸易或者国际收支表现为顺差时,对外贸易才会增加该经济体的就业,并且国民收入的增量是贸易顺差增量的数倍。Melecky(2005)通过对中东欧国家经常项目差额变化研究发现,经常项目顺差若发生逆转,则会导致经济增长率减少 1.1%。贸易顺差形成的外汇储备增加,有利于增强我国抵抗外部风险的能力,增强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信心,有利于推动国内技术进步,促进国内就业和资本积累。于渤等(2009)基于投入-产出法及计量经济定量分析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大于负面作用。从实现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角度来看,减少我国“双顺差”中的贸易顺差,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减少顺差不是目的,而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手段。

1.1.1 理论意义

本书尝试从跨时贸易的视角出发,通过贸易顺差结构、影响因素、效应和国际比较的分析,考察了我国贸易顺差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并通过对贸易顺差历史的考察,总结了贸易顺差的演进规律。另外,本书还基于跨时贸易理论和内生结构突变的计量方法,实证分析了我国贸易顺差的可持续性,对贸易顺差的影响因素及效应进行了实证。理论意义在于:① 推动相应的国际贸易理论在我国的实证应用;② 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并促其发展;③ 为相关学者的研究提供学术参考。

1.1.2 实际意义

第一,从顺差结构来看,只有对中国贸易顺差结构进行全面分析,才能明确在新的国际、国内背景下我国外贸发展战略调整的着眼点和立足点,缓解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贸易摩擦,正确定位贸易政策。

第二,从顺差持续性上看,我国外贸顺差的可持续性不仅关系到出口增长的发展趋势,也关系到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等诸多方面。贸易顺差能否持续,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国外贸、外汇、外资、财政等政策的走向。只有在认清我国贸易顺差的本质及判断其能否持续等条件下,才能有针对性地制定政策,充分发挥其对经济发展的正面作用,降低其负面影响。

第三,通过与日本、德国贸易顺差比较研究,总结出他们改善贸易顺差的经验教训,特别是通过研究这些国家*经济发展的政策与制度安排对贸易顺差的影响,会对中国贸易顺差的改善提供有益借鉴。

1.2 文献综述

对于经常项目的不平衡,国内外许多学者进行过研究。这些研究主要涉及经常项目顺差产生的原因、国际收支失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贸易平衡的路径选择以及经常项目顺差或逆差的持续性等四方面的内容,本节仅列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和研究。

1.2.1 关于经常项目顺差产生的原因

对于经常项目顺差产生的原因,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学者,都是仁者见

*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协定》,本书所涉及的“国家”为广义的概念,包含通常意义上的独立经济体。

仁、智者见智,基于不同视角阐述各自不同的见解。简单归纳如下:

1. 汇率论

许多学者研究了汇率与贸易收支的关系。Miles 等(1979)^[1]采用回归方法研究了14个国家货币贬值和贸易收支之间的统计关系,认为货币贬值不能改善贸易收支。Haynes 等(1986)^[2]研究了日美贸易收支与日元汇率之间的关系,认为日元汇率不影响日本对美国的出口额,而日元汇率影响美国对日本的出口额。Marwah 等(1996)^[3]基于美国1977~1992年的数据,对汇率和贸易收支进行了分析,得出前几个季度存在J曲线效应,一段时间后,贬值反而会恶化贸易收支。Bahmani-Oskooee(2001)^[4]认为中东国家实际贬值可以改善贸易收支。Baharmshah(2001)基于1980~1996年的季度数据,采用协整技术分别分析了马来西亚与美国、马来西亚与日本的双边贸易收支与实际有效汇率的关系,认为双边贸易收支和实际有效汇率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并不存在J曲线效应。Mohammed B. Yusoff (2010)^[5]采用协整技术分析了马来西亚实际有效汇率、贸易收支、国内生产总值的关系,认为其货币林吉特贬值总体上能改善其贸易收支,提高国内生产总值,但中间有一个恶化过程。

从国内实证研究来看,沈国兵(2005)^[6]认为人民币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没有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人民币汇率升值并不能改善中美贸易逆差。叶永刚等(2006)^[7]采用协整技术分别对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中美、中日贸易收支的影响是不同的,在短、长期,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均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人民币有效汇率与中日贸易收支之间互为因果关系。人民币有效汇率对中美、中日贸易收支均不存在J曲线效应。人民币汇率并不是解决中美、中日双边贸易收支问题的有效工具。严智杰(2007)^[8]利用中国1996~2005年的季度数据,运用协整技术对中美双边贸易收支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人民币汇率并不是解决中美贸易问题的有效工具。李辉(2008)^[9]采用1981~2006年的年度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加工贸易进出口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下降会促进加工贸易进出口的增长。李惊雷、刘钟钦(2008)^[10]认为人民币的升值不会恶化我国的农产品贸易收支,在今后较长时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上升对我国农产品的对外贸易将不会产生较大的影响。王瑞芳等(2008)^[11]基于我国1980~2004年的年度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国贸易结构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汇率与总贸易结构、出口贸易结构互为因果关系。徐炜、孙俊(2008)^[12]基于1994年1月至2005年7月、2005年8月至2006年11月这两个阶段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我国进出口总额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2005年7月21日汇率改革的实施,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

我国进出口的影响正在减弱。许梅恋(2008)^[13]认为人民币升值能够有效削减我国贸易顺差,但是,在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同时存在且一般贸易占比较小时,人民币升值对削减我国贸易顺差的作用被弱化。崔民强、赵倩(2009)^[14]基于1995~2008年的中国进口贸易额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 REER 月度数据,对初级产品进口占总进口的比重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我国初级产品的进口比重与 REER 之间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汇率变动能调整我国的进口商品结构,反之亦然。李志斌(2009)^[15]运用1995年1月至2007年9月的月度数据,对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与中美贸易收支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人民币汇率波动率的增加有助于缩小中美贸易收支顺差,在短、长期内人民币汇率升值都不能解决中美贸易问题,中美贸易问题的重要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导致的进口需求。林欣(2010)^[16]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分析了我国汇率改革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中美进出口贸易的影响,认为短期内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会使进出口减少,从长期来看,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的升值导致进口的减少、出口的增加,且对进口的影响要小于对出口的影响。朱其堂、谭志雄(2010)^[17]基于1982~2007年的相关数据,对我国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和进口贸易的关系进行了计量分析,认为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波动对进口贸易的影响说明了贸易的J曲线效应存在。从短期来看,人民币升值可能会加剧贸易不平衡。房红(2012)^[18]认为中美贸易顺差的增加导致人民币汇率上升,所以,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解决不了中美贸易失衡问题。殷功利(2014)^[19]认为我国在2005年汇率改革后,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升值大于20%的条件下,反而增大了我国贸易顺差。因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要求人民币升值以改善其贸易逆差在实践中是不合理的。

2. 储蓄与投资失衡论

余永定(2006)^[20]通过对我国储蓄和投资进行分析,认为中国双顺差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国内储蓄和投资的差距。唐建伟(2007)^[21]认为由于消费不足导致储蓄过高,而高储蓄导致高投资。在国内消费疲软的状况下,高投资所形成的过剩产能只能通过出口得以释放,从而导致了中国的贸易顺差。许少强、焦武(2007)^[22]基于中国1985~2005年的CA占GDP的比例与S-I占GDP的比例数据分析,得出经常项目余额跟储蓄-投资缺口高度相关,其相关系数为0.9537,它们的变动趋势基本一致。因此,认为中国长期持续的经常项目顺差是国内储蓄长期大于国内投资导致的。余永定、Midsuhiro Fukao、Dennis Snower(2006)^[23]认为从长期来看,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市场的滞后、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等不平衡是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重要原因。而短期原因是由于储蓄和投资失衡导致的。史焕平(2006)^[24]认为近几年贸易的持续性顺差是由于国内消费和投资失衡所致,中国消费过低,在高投资和高产出的情况下,国内产品到国外寻找出路,导致经常项目持

续顺差。李扬(2006)^[25]认为中国长期的贸易顺差是由储蓄-投资缺口造成的,并认为若政府以降低储蓄率为政策目标,其着力点应在于改善收入分配结构。郭海峰(2007)^[26]以“挤出效应”来解释储蓄-投资不平衡导致的贸易收支顺差。当投资小于储蓄时,国内消费需求不足,产能过剩只好投向国际市场来实现价值,同时进口商品也被国内商品所取代。席洪伟、苏晓东、陈怡(2008)^[27]基于我国1990~2006年的储蓄-投资缺口及贸易顺差年度数据,运用协整检验、误差修正模型及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等方法分析得出了储蓄-投资缺口与贸易顺差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关系。蔡德容、马南南、万建永、李曼(2008)^[28]分析了中国经常项目失衡、储蓄-投资失衡的现状后,采用协整分析方法检验两缺口模型在我国宏观经济中的适用性,得出经常项目顺差是由储蓄-投资失衡决定的。丁骋骋(2008)^[29]认为一方面医疗保障、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导致人们的预期恶化,另一方面国内金融体系的不发达导致人们可供选择的投资渠道有限。这两方面造成储蓄过剩,而储蓄过剩又导致经常项目顺差。夏君亚(2008)^[30]认为我国外贸失衡的经济根源是储蓄-投资失衡,我国贸易长期顺差跟我国较高的储蓄率和内需疲软紧密相关。解佳转(2010)^[31]认为由于中国国内消费不足,高储蓄带来的高投资从而形成的产能过剩只能借助出口得以释放,进而导致了持续性的贸易顺差。潘悦(2012)^[32]认为高储蓄一般需要转变成高顺差,中国贸易顺差是储蓄的外部表现形式。李新、邹宏元(2014)^[33]基于Johansen多变量协整检验结果表明,从长期看,人均GDP越高,政府部门的储蓄-投资余额越大,总抚养比越高,越能引起经常项目余额的增加;从标准方程的系数来看,政府部门的储蓄-投资缺口和总抚养比的系数相对较高,这就反映了在长期中,这两者是我国经常项目余额的主要影响因素。

3. 金融市场不发达说与人口年龄结构论

徐许、闵骅(2001)^[34]认为由于我国国内信贷资源配置存在扭曲,“该借的借不到,该贷的贷不出”,企业不得已只好走迂回路线,先借外债再兑成人民币。这样国内信贷资源配置扭曲,通过国外FDI产生我国贸易顺差。王信(2005)^[35]认为金融市场发展滞后,导致一系列相互联系的问题:如金融资源主要从国有银行流入国有部门及制造业,导致许多制造业大量产能过剩,其中大部分通过出口得以消化;难以发展基金制养老保险计划,结果是居民预防性储蓄大增;由于产业结构调整缓慢,导致大量需求较旺的产品及服务供给不足,进而抑制了整体消费;不能有效地转化国民储蓄为投资,多余的储蓄流向海外市场;人民币汇率弹性比较小,可能存在某种程度的低估,等等。这些问题在客观上推动了出口增长,并抑制进口需求,结果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张少华(2005)^[36]认为我国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项目顺差都与我国金融抑制环境下产生的融资约束有关。王叙果(2006)^[37]基于国民收入恒等式、中国经常项目余额与储蓄-投资关系的经验数据、金融约束导致经常项目失衡的理论分析及影响机制的分析,认为金融约束导致的储蓄-投资关系不协

调是经常项目顺差的根本原因。张家胜、祁春节(2007)^[38]认为我国贸易收支出现顺差的直接原因是国内投资过度扩张、国内有效需求不足、国民储蓄超过国内投资、贸易品生产相对过剩与公共品供给不足。而金融抑制、人口红利、大规模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地方政府行为扭曲等因素决定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将在一段较长时期内存在。汤玉刚(2008)^[39]认为国内金融市场的扭曲导致我国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无法通过现有的国有垄断金融系统获得相应的贷款,国外直接投资便成为国内经济突破结构性金融约束的工具。从这个角度看,可以说正是国内金融市场的扭曲造就了国外 FDI 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样国内金融扭曲通过国外 FDI 导致我国贸易顺差。韩剑、李林艳(2012)^[40]认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贸易项目顺差减小、逆差扩大。李宏、刘茜(2014)^[41]认为传统的贸易失衡机制理论很难解释当今全球贸易失衡。经济内部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是导致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全球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以美国、英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利用其在国际货币中的历史地位,构建了以虚拟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系,形成了以金融服务为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中国、德国和日本则逐渐形成了以制造业为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

王仁言(2003)^[42]通过检验分析,认为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与我国贸易差额关联不怎么显著,我国贸易差额的关键因素是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而引起消费、投资-储蓄的变化。王信(2004)^[43]认为人口结构变化引起国内储蓄-投资的变化是导致我国贸易顺差结构的关键因素之一。朱庆(2007)^[44]通过实证分析,认为我国高比重的劳动年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得我国经常账户保持顺差。徐晟(2008)^[45]基于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国际收支的传导机制、中国人口红利的消减与国际收支双顺差的视角研究分析后,认为从长期来看,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影响作用将远大于人民币的实际汇率及投资率所产生的影响,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化对中国经常账户的影响将抵消或超过人民币的实际汇率的升值及投资率的降低对经常项目逆差所产生的影响。任亚男、顾红侠(2008)^[46]认为中国的当前及今后 10~15 年人口负担将比较低,处于“人口红利”期。较高比例的工作年龄人口使得中国储蓄率升高,而投资率没有以同等程度的提升,结果表现为经常项目顺差。故中国当前及今后 10~15 年高储蓄率与经常项目顺差并存是中国人口年龄结构所处阶段导致的,是个体储蓄、投资理性选择的宏观加总的表现。但是,预计 2020~2030 年中国将进入人口结构演变的第三阶段。新中国成立后期的婴儿潮人群面临退休,改革开放时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出生的一代在数量上无法顶替前人,导致人口中劳动者比重下降,而老年人口抚养比重上升,我国“人口红利”将会消失,储蓄率将下降,进而经常项目顺差将减小,还可能出现经常项目逆差。钟水映、李魁(2009)^[47]基于 1982~2007 年的相关数据,采用协整检验等技术方法研究了劳动力抚养负担、经济增长与经常项目差

额之间的动态关系,得出它们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长期来看,劳动力抚养负担对经常项目差额有反向作用,劳动力抚养负担每降低1%,经常项目差额将提高0.997%;而在短期内,劳动力抚养负担对经常项目差额的作用是不显著的。在短期和长期内,经济增长与经常项目变动都密切相关。朱超、周晔(2011)^[48]从人口结构变迁的角度分析,认为没有太大必要过分地关注短期的经常项目差额。汪伟(2012)^[49]采取中国1993~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结果为:人口结构变化约能解释中国经常账户余额变化的45%。在其他解释变量被控制后,人口年龄结构变量对经常账户的影响仍然显著。刘渝琳、刘铠豪(2015)^[50]利用我国部分省、市、自治区1989~2012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人口结构变化对一国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结果表明,少儿抚养比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且该负效应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而增强;老年抚养比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并不显著;人口性别比对我国经常项目收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该影响随着经济发达程度的提高表现出倒U型特征。人口结构变化能够解释我国经常账户变化的25%,是经常账目收支持续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

4. 重商主义说和加工贸易说

李鸿飞(2004)^[51]认为:中国各地在大力引资的同时,却没有重视“走出去”,中国在根子上存在“重视出口,轻视进口”的观念,导致了持续性的贸易顺差。余永定、覃东海(2006)^[52]认为中国长期实行优惠的FDI政策,尤其是加工贸易型FDI优惠政策是中国“双顺差”的原因。刘华、卢孔标(2006)^[53]认为,中国长期以来奉行的是以“出口创汇”“千方百计扩大出口”为基本原则的传统贸易战略。为了扩大出口创汇,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为出口企业提供优惠贷款、出口补贴、退税、贴息等。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经济增长甚至已经形成了对出口的“路径依赖”,国家还是鼓励以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所以,中国以促进出口为导向的外贸发展理念致使出口不平衡增长。林松(2006)^[54]基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了中国“双顺差”现象,认为除了学者们认为的引资错位外,中国经常账户中存在着重商主义倾向,这也是致使这一结果形成的重要原因。唐建伟(2007)^[55]认为改革开放后,中国为解决资金、外汇短缺跟经济发展的矛盾,采取了许多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如国家调整出口退税率、1994年的汇率改革、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等,导致了持续性的贸易顺差。王晋斌、李南(2007)^[56]认为出口导向型的外贸政策是导致我国大量贸易顺差的基本原因。张蕾蕾(2007)^[57]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为了缓解资金、外汇短缺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我国在贸易上重出口、轻进口,并采取了一系列“奖出限入”的优惠政策和“进口替代”措施,这些出口导向政策导致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刘向丽(2009)^[58]认为在中国,“出口创汇”这一政策目标得到了中央和各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实施。基于我国现行财税体制的限制和地方政府追求政绩的需求,“出口创汇”仍然出现在部分地方政府的年度工作报告

中,是中国对外贸易顺差的主要原因之一。殷琳(2009)^[59]认为中国鼓励出口是中国发展对外贸易的一贯政策,如传统出口退税、信用保险的出口支持及出口信贷政策,加入世贸组织后政府各部门推出的一些改革措施促进贸易便利化,是导致中国贸易顺差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何伟文(2012)^[60]从数据和事实的视角,实证了我国不是出口主导型经济体。

卢锋(2006)^[61]从经济学理论及国际检验的视角来考察中国贸易顺差的含义和特征,认为我国“双顺差”的直接原因是加工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双重作用,深层根源在于产品内分工时代背景跟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之间的互动联系。余永定、覃东海(2006)认为长期推崇吸引 FDI,特别是加工贸易型 FDI 的优惠政策是中国“双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邓立、张坤(2006)^[62]认为我国加工贸易占出口主导地位,外商通过对华投资开展加工贸易,这样就创造了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简志宏、王雪珂(2007)^[63]认为加工贸易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直接原因。桑百川(2007)^[64]认为我国对外贸易失衡的根源在于外商直接投资,而外商直接投资是通过加工贸易的形式来增加我国对外贸易顺差的。朱箴元(2007)^[65]认为近些年来,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约占一半,随着我国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贸易顺差也就自然增加。许少强、焦武(2007)^[66]基于中国 1985~2005 年的经常项目余额与加工贸易余额数据的对比分析,得出:尽管同期加工贸易余额波动幅度小于经常项目余额,但两者的总体变动趋势还是基本一致的,其相关系数为 0.9574。因此,认为加工贸易有比较大的持续顺差是导致近些年来经常项目持续盈余的重要原因之一。翁曼莉(2008)^[67]认为从 1990 年开始,我国就采取了吸引外资、出口创汇、加工贸易、出口退税等经济促进政策。长期以来,我国的出口贸易方式都以加工贸易为主,它已占据我国对外贸易的“半壁江山”。而加工贸易是一种增值的贸易形式,必然会产生贸易顺差。孙亚菲(2008)^[68]认为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加工贸易是我国经常项目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潘悦(2012)认为处于全球产业链上的加工贸易发展必定带来贸易顺差。周小琳、王浩明(2014)认为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具有支配地位,几乎贡献了我国全部的贸易顺差。

5. 全球化说

赵夫增(2006)^[69]认为世界经济结构性变化——经济全球化和金融膨胀,导致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从而引起中国等国的贸易盈余。卢锋(2006)认为我国“双顺差”是我国践行改革开放和参与全球产品内分工的特定阶段的产物。Erik(2006)认为国际收支失衡是跟全球化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在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中融入世界经济,并把外来资本和国内廉价的劳动力结合在一起,从而出现了中国国际收支的失衡。张少军、张少华(2008)^[70]基于 GVC 视角,采用实证分析方法,认为中国利用低端禀赋优势加入全球价值链,成为世界工厂,这样导致了我国经常项目的顺差。丁骋骋(2008)^[71]认为中国出口的商品大量是以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的

劳动密集型产品,这种出口结构与我国在世界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是相对应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以欧美为首的发达国家不断进行产业结构调整,把传统的制造业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加工制造环节大规模地转移到有成本优势的像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从而导致中国形成了贸易顺差。王子先(2010)^[72]认为中国“双顺差”的生成是全球化条件下中国开放式工业化过程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一定阶段,中国出现“双顺差”是巨大进步和历史必然。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李鸿飞(2004)^[73]认为1994年中国工业制成品贸易竞争指数从负转正,进而持续增长,说明了中国制成品已经逐渐表现出竞争优势。在劳动密集型产品及低端技术产品上,中国拥有较强的竞争力,并且中国的某些技术密集型产品也转变为比较优势。中国贸易竞争力的提高促进了出口增长,进而导致了我国经常项目顺差。付秋虹(2005)^[74]认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得益于我国出口产品全球市场竞争力的增强、不断提高的开放程度、日益融入全球经济的现实、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改善。许雄奇等(2006)^[75]采用时间序列方法,认为我国贸易盈余的原因之一是增加的财政赤字。刘安奎等(2007)^[76]认为在我国出口企业工作的人员中,农民工占有很大比例。由于我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市场机制又不完善,因此农民工权益缺乏基本保护,农民工工资被长期压低,甚至拖欠的情况时有发生。杨继军、张二震(2008)^[77]认为出口行业(制造业)的生产率增长速度快于进口竞争行业(服务业),基于“放大效应”的作用下,结果出现了出口行业产出增速较快和出口规模急剧扩张,从而形成贸易顺差。刘向丽(2009)^[78]认为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严格的技术出口管制措施是中国外贸顺差的重要原因之一。王子先(2010)^[79]认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对外开放和承接产业转移大幅提高了我国出口产品竞争力,另外加上我国国内市场供求发生了向买方市场转折性变化,我国对外贸易进入持续顺差阶段。张二震、马野青(2010)^[80]认为我国国内商品市场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分割,这种分割制约了进出口,并且对进口制约更大,这样就促进我国贸易顺差。黄益平、陶坤玉(2011)^[81]认为我国外部失衡的根本原因是不对称的市场化及相关要素市场的扭曲。江春、腾芸(2011)^[82]认为我国现行的制度压抑了国内企业家精神是我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重要原因所在。李宏、刘茜(2014)^[83]认为经济内部结构的非均衡发展是贸易失衡的根本原因。

1.2.2 关于国际收支失衡对宏观经济的影响

裴平、孙兆斌(2006)^[84]采用AECN指数体系,从国际收支失衡的角度出发对1985~2004年我国的货币错配进行了实证分析,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国际收支失衡导致了严重的货币错配。曲凤杰(2007)^[85]认为贸易收支持续顺差对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构成了现实的威胁和挑战,包括:①使得我国成为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的焦点,恶化了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并可能成为全球失衡调整的“买单”